

# 假如文物会说话 听它们说说广州历史

广州之所以叫广州,从文物证史的角度,有“晋‘永嘉’铭文砖”首次出现广州一词;番禺之所以叫番禺,同样有类似的实证,有“秦‘番禺’漆奁”;还有“广”字开元通宝钱作为广州见诸史志记载的最早一次地方铸钱……假如这些文物会说话,它们会如何自我介绍?新快报收藏周刊记者尝试用第一人称,模拟它们的自白,听它们说说广州的历史。



■汉“内清以昭”铜镜

## 汉“内清以昭”铜镜

中国是世界上最早使用铜镜的地区之一

体形圆,宽(直径)11厘米,有一个圆球纽、圆纽座。“我”是出土于广州市海珠区大元岗汉墓的铜镜,是这里出土年代较早的铜镜之一。“我”名叫汉“内清以昭”铜镜。“我们”这类铜镜纹饰基本一致,考古出土或传世者较多,可见当时数量大流传广,历代金石图籍也多有辑录。

“我们”的背面铸铭文,是战国晚期出现的一种新式样。经过西汉早期的发展,至汉武帝以后,铭文逐渐成为铜镜纹饰的重要组成部分,成为汉代铜镜一个显著特征。而“我”背面的铭文则有“内而清而以而昭而明而光而夫而日而月而不而泄”。但通常认为铭文中的“而”形应是铭文中间的间隔装饰,不宜释读作“而”字。按铭文内容可分为昭明镜、日光镜、清白镜、铜华镜、日有熏镜、毋忘镜等。中国是世界上最早使用铜镜的地区之一,铜镜因镜背多有精美图案铭文纹饰,成为古代青铜器中独成体系的精美工艺品。

## 唐开元通宝“广”字铜钱

见诸史志记载的最早一次地方铸钱

“我”是唐开元通宝“广”字铜钱,“开元”意思为开辟新纪元,并非唐玄宗的开元年号。在唐代所铸行的钱币中,开元钱是最先铸造和最重要的一种,且流行通用时间最久。

唐武宗会昌五年(845)毁各地佛寺,将寺中佛像钟磬等销毁以铸铜钱,淮南节度使李绅率先在扬州于开元通宝钱背加铸“昌”字以纪地望。自此各州钱炉均于钱背铭以州名,此类加铸背文之开元通宝通称“会昌开元”。“广”字开元通宝钱是广州见诸史志记载的最早一次地方铸钱。丁福保《古钱大辞典》及其他多种钱谱金石图籍辑录有该类钱。



■唐开元通宝“广”字铜钱

## 南汉“芳华苑”铁花盆

见证广州荔枝湾一带旧时繁华

史称南汉刘氏豪奢极欲,多建离宫园囿,如《旧五代史》卷一三五《僭伪传·刘陟》:“起玉堂珠殿,饰以金碧翠羽。岭北行商,或至其国,皆召而示之,夸其壮丽。”

芳华苑,南汉兴王府苑囿之一,位置在今广州荔枝湾一带。清屈大均说苑在城南,见《广东新语》卷十七《宫语·名园》:“城南有望春园,有芳华苑,亦伪南汉遗迹。”而“我”,则是这里的一个铁花盆,又名南汉“芳华苑”铁花盆。原为顺德吴荣光筠清馆旧藏,后辗转流徙,1956年入藏广州博物馆。“我们”另有一同类也藏于广东省博物馆,是南汉大有四年“芳华苑”铁花盆,形制款识与广州博物馆所藏相同,唯多一个六角形浅托盘。“大有”,南汉高祖刘岩年号,以《周易》筮之而改,本是卦名。大有四年,即后唐长兴二年,值公元931年。



■南汉“芳华苑”铁花盆

### 参考书目

《字字珠玑——广州博物馆典藏铭文刻辞类文物选》,文物出版社  
《如果国宝会说话》,五洲传播出版社



■番禺漆奁(广州博物馆)

## 商“子系”铜爵

爵是中国最早出现的青铜礼器之一

商代有“诸子”之器,金文格式为“子某”或“某子”,一般认为是王或族长之子。

“我”是商“子系”铜爵,爵是中国最早出现的青铜礼器之一。“我”出土于河南安阳,经由容庚捐赠,所以“我”来到了广州博物馆。“子系”是器主之名。

如果对“我”不了解的,可以在《说文·鬯部》上找到“我”的介绍,“爵,礼器也,象爵之形,中有鬯酒。又持之也,所以饮器象爵者,取其鸣节节足足也。”这里说的“象爵者”,借爵为雀,爵、雀古字通。“我们”的一般形状,前有流,即倾酒的流槽,后有尖锐状尾,中为杯,一侧有鬯,下有三足,流与杯口之际有柱,此为商和西周早期爵的共同特点。

目前,铭文中明确爵的用途的,只有白公父爵,“白公父作金爵,用献用酌,用享用孝。”

青铜爵一说可用于烹煮酒或温酒,少数爵之杯底有烟痕,但绝大多数是没有烟痕的。且三足入火稍久,青铜中的锡即易析离而损坏器表,故多数纹饰精美之爵作为煮酒之温器的可能性不大。



■商“子系”铜爵

## 秦“番禺”漆奁

“番禺”地名考古实物最早一例

当你们看到“我”的时候,“我”已经在土地里长眠了2000多年,幸亏考古学家们的发掘,让“我”得以重见天日,关键是,“我”身上烙印着“番禺”二字,应是在本地制造,或者是由南海郡治番禺所定制。目前“番禺”地名见于考古实物最早的一例,被认为是秦朝统一岭南并推行郡县制的重要物证。

1952年,秦“番禺”漆奁出土于广州西村石头岗秦墓。“番禺”是南粤一个古老的地名,从广州地区秦汉考古出土的诸多带有“番禺”或“番(蕃)”铭文的文物即可为徵。自古至今,“番禺”二字之含意众说纷纭,系而论之,一为“番山、禺山说”,一为“番山之隅说”,一为“古越语音译说”。带有“番(蕃)禺”或“番(蕃)”铭文的文物在两广秦汉考古中多有发现,广州象岗山南越王墓出土铜鼎,有一些刻有“蕃”“番禺”铭文;南越国官苑遗址石构水池石板面上有阴刻“蕃”字;南越国官苑遗址西汉水井出土木筒有“蕃池”“番禺人”文字;广西贵县罗泊湾1号汉墓出土铜鼎上刻有“蕃”字……“番禺”地名出现频率之高,涉及范围之广,在全国历史文化名城实属罕见,可知甚有渊源。



■晋永嘉铭文砖

## 晋“永嘉”铭文砖

“广州”出土文物中首次实证

“永嘉世,天下荒,余广州,皆平康。”“我”是一块砖,来自一千多年前的西晋“永嘉”。但“我”并不是一块普通的砖,而是一块铭文砖,更因为“我”身上有“广州”一词,使得“我”成为“广州”二字在出土文物中的首次实证。

“永嘉”是西晋怀帝司马炽在中原所立年号,永嘉七年(313),正值北方五胡进犯京洛,怀帝本人于此遭掳,酿成了史不绝书的“永嘉之乱”。永嘉前后的荒乱局面在中国历史上都是少见的。连年战乱、民族冲突、瘟疫流行、灾害饥荒。五胡、流民、诸王、盗贼、饥荒成了这一时期史志中出现最频繁的字眼。在当时四处战火连天,人心惶惶,五岭以南的广州却处于“皆平康”的社会局面,不受战乱、荒灾的影响。正是基于这种相对和平安定的生活环境,广州才能出现“永嘉七年癸酉皆宜价市”的良好局面。还说明那时的广州居民,可以开设集市,自由进行商品贸易。

“我”身上的铭文歌颂了永嘉年间南方州郡民众安居乐业、经济繁荣的社会景象,反映了晋南朝时期中国北方动荡,南方稳定,北人南迁,人民安居的宏大史事。